

## 我们在「外围」

董地轴

早年读《新概念英语》第四册，里面有一篇关于体育精神的文章，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众若在足球场或板球场上交锋，就不愿在战场上互相残杀。可见，足球之类的体育赛事在人们心中是多么激烈。

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也不管你懂不懂足球，一场惊心动魄的足球赛，肯定让你废寝忘食。足球给普通的体育爱好者以无穷的乐趣和回味，给商人带来无限的商机和财富，让智者思考，让仁者更爱生活。足球带给人们的震撼是其他任何运动都无与比拟的。

前段时间，又值世界杯赛事，由于网络信息的便捷，各个国家的朋友便能像坐在一起那样，随意侃大山，聊起世界杯。

朋友克鲁兹是菲律宾圣卡洛大学的一位老师，他说，为了看世界杯，自己家里还更换了电视机，到超市买了很多中国产的方便食品，打印了赛程表贴在客厅，准备度过一个不眠之夜。

英国朋友史蒂文森说，他把自己的小窝装饰得充满足球气息，买了很多啤酒。偶尔也打算和球迷去酒吧看球，决赛那天他可能前往巴西，如果去不成，也要去伦敦的广场上与球迷共享决赛盛宴。

比埃尔和加里曼是法国鲁昂的两位朋友，他们曾在合肥学习武术两年，我们相处甚好。比埃尔在网上说他7岁就开始踢球了。家住在鲁昂工业区，那里有

很好的足球场。他第一爱好中国武术，再次就是喜欢足球。

武术和足球是他最大的爱好，来中国，读书，参加工作，一路走来，他始终没有放下这两个爱好。英超、欧洲杯必看，有时候“足球到哪里，我就到哪里。有时候兴奋起来，我在电视机面前边打太极拳边看球”。比埃尔如是说。

49岁的布莱恩是南非一家慈善机构的负责人，一生痴迷足球。他说，他已经买好了去巴西的机票。他喜欢西班牙队、葡萄牙队、巴西队、德国队，而他认为这次德国队有夺冠的希望。

布莱恩说起1998年法国世界杯决赛：“我崇拜罗纳尔多，可是赛前他突然生病昏迷，上场后状态很糟糕，最后，巴西队输给了法国队。我失望透顶，沮丧了很久。”

艾米丽是我在英国认识的一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老师，现在在克罗地亚任教。她说：“我们女性也热衷于足球。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是我第一次接触世界杯，当时我在火车上听广播里的开幕式。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，我和朋友一起飞往现场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世界杯的现场比赛，从此，足球的魅力在我心中永驻。”她还说，这次她的电视机的使用率要大大提高了。

澳大利亚托斯玛利亚的一位朋友说，“我们其实是在世界杯‘外围’了。”

## 滨州帝师杜受田

老茂

可能是我孤陋寡闻，对杜受田不甚了解。偶尔听到“兄弟争储”的故事，说清朝道光皇帝的四子奕訢与六子奕訢的储位之争，是清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期间最富戏剧性的情节之一。奕訢的才干远胜奕訢，但奕訢年长且为皇后所生，道光因此举棋不定。才干平庸的奕訢遵从老师“藏拙示孝”的策略，促使注重儒家仁孝思想的光道，最终选择传位于他，即后来的咸丰皇帝。原来，这位帝师就是杜受田，可以说，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杜受田(1787年—1852年)，字芝农，山东滨州凤凰人，道光三年(1823年)进士，曾任翰林院编修，山西学政，左都御史，工部、吏部、刑部尚书，协办大学士，上书房总师傅。

那么，杜受田何以脱颖而出担当帝师，还辅弼过十九岁登基的咸丰皇帝呢？这里又有一则“同荐帝师”的典故。道光为皇四子挑选老师，当时翰林院两掌院学士都推荐杜受田，道光经过考察，确认杜“秉公端正、励节直清、经术渊醇、体用兼备”，遂命其入书房，御批“以书房为根本之地，非只诵诗读书肄习文艺，务使皇子深明理道变化气质。所以充此任者，必求端人正士。今以皇子付汝，以后朕悉不与闻。”可见，因杜受田德才俱佳，方被道光器重并委以帝师等大任。

2014年清明前夕，我有缘来到滨州——这个素有“一座杜家宅，明清两朝史”之说的地方。听闻杜受田故居保存修缮完好，我迫不及待地前去探访。滨州杜家是明清望族，久有“一门之盛，甲于天下”的美誉，以“一门十二进士”，“四世六翰林”，“四代为相”而扬名。更加值得杜家引以为豪的是，六百余年家族长盛不衰，打破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常规。

杜受田故居位于滨州市老城

区，实际上也是杜氏一脉相承的旧居，以杜受田为主线，穿插家族其他成员。故居始建于明朝中期，占地约十四亩。现在可供参观的主要建筑有：聚德堂、忠孝堂、荣德堂、翰林堂、绍德堂、祠堂、东厢房、绣楼、太康第等。整体布局有序，大致以中心轴线为主，东西均衡排列，显得简洁实用。大门内正上方悬挂着“方伯第”、“相国第”、“传胪”、“会元”、“亚元”等牌匾，既是杜氏子孙身经百炼的荣誉，更是苦读寒窗的结晶。

大门旁的照壁很有气势，上面有一块荷花图案的方形砖雕，“莲出污泥而不染”，象征着与莲同洁。杜家先后为官者数百人，其共性是清正廉洁。

西南角的一幢普通房子被称为“钢柱子”，成为杜家“办事勤慎，不欺压相邻”的载道口碑。杜家准备扩大居住规模，各迁移户由于杜家的价格公道都主动搬走，唯西南角这户人家，无论如何不愿让迁。杜家不以势压人，含蓄地说，这家如此品性刚烈，是我们杜家院子的钢柱子，留下也好。在此，我则联想到安徽桐城“六尺巷”的典故，可谓异曲同工。

作为故居里的两幢重点建筑，东厢房与绣楼，同建于明朝万历年间。东厢房是杜受田幼年到青少年居住生活之处，且资料介绍，杜家十二名进士中有十名进士和五名翰林都曾生活在此房。绣楼亦称阁楼，为二层砖木构造，是故居内位置最好、楼层最高的建筑，是杜家女眷居住和活动场所，楼下生活居室，楼上琴棋书画。

参观过程仅有一个多小时，只能有雪泥鸿爪之印象。当余兴尚浓时，回眸宁静的杜翁故居，恍如听见“净明山房”里传出了琅琅读书声，揣测杜翁这位“端人正士”在教授奕訢、辅弼新君的场景。

## 做饭的学问

曹知情



买菜做饭，人人皆会、家家皆有。对于上有老、下有小的我来说，买菜做饭，变化的是不同的菜式，不变的是烹饪家的味道，是一种亲情、一种生活方式。

岳父母居住淮南，老婆、孩子工作、学习也在淮南。因此，每逢周五下班，我都匆匆从合肥赶到淮南，雷打不动、风雨无阻。当然了，周五晚上的饭局及其他一切应酬，我都会谢绝的。

岳父母均有八十多岁，小女也有八岁多。我周六周日的任务就是买菜做饭、陪伴孩子和老人。倒是夫人非常辛劳，不仅是她工作比较忙，更有一个比较淘气的小女，除学习、睡觉之外，整天到晚缠着她、爱着她，缠得她心烦、爱得她喘不过气来，导致她人消瘦了、头发也白了。

岳父母的家与我们的家距离不远，十分钟就能够走到。每周买一次菜送去已成习惯。

每周日或周六去岳父母家洗菜、烧菜、做饭、洗碗还有唠嗑也成了习惯了。如有哪周因小女学习任务重、时间紧没有去，岳父母肯定会问三问四，埋怨之情、失落之心便可在

问三问四中略知一二了。其实，岳父母有六个子女，这六对夫妇都很孝顺、孝敬老人，门邻们羡慕，就连值班的门卫也称赞不已。

我做的饭菜虽不精致，但却比较可口，每上一道菜问小女怎么样，她的回答均是两个字：好吃！看小女吃饭津津有味的样子，我会目不转睛、心潮澎湃，似乎和她一样在咀嚼饭菜的味道，更在品尝人间的亲情。

每当小女在电话里问：“爸爸你到哪儿了？”、“爸爸你在干嘛呢？”等等那种打破砂锅纹(问)到底、那种乳臭未干的甜甜童音，总是让我喜悦、让我揪心！

最让我心动的是，周日晚上回合肥的时候，我已下楼且出了小区的大门，可小女站在四楼的窗前“爸爸再见！爸爸再见！”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，我都上出租车了，还能听到小女的送别之音，淘气聪明可爱的小女总是让我牵肠挂肚、魂牵梦绕……

为老人和孩子买买菜、做做饭，是一种生活，是一种亲情，更是一份责任、一种牵挂、一些期许、一缕柔情……

## 绕不开的王小波

李寅初

用了大半个晚上，读完了乐文城先生的《王小波传》。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王小波的传记，笔路蓝缕，自有拓荒之功。虽然此前我已经读过一些研究王小波的文章，大致了解他的生平，但零零碎碎，不成系统。

对于我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文学青年来说，王小波就是一个用来寻找同类的接头暗号，是绕不开的存在。他的狂欢式文体，对黑色幽默、反讽技巧出神入化的使用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冲击了很多人，也启蒙了很多人的写作。他对国学、民族主义、气功等问题的看法，显示了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，也深深地影响了许多热血青年走上理性、经验之路。

而他与体制的决裂，他的生存方式则更显意味深长。王小波一生反对被“设置”的生活，始终身处“文坛”之外，与体制有着天然的隔膜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他辞去教职，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自由撰稿人之路。在一个体制化生存深入骨髓，市场化媒体尚未勃兴的年代里，这不仅是一种自信和勇气，更是一种理性的自觉。这种生存方式的意义，恰如学者朱学勤所言“至少能提醒人，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高头讲章，它还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态度。”

对我个人来说，王小波更像一个启蒙地图。正是因为中学时代偶然读到王小波，我才知道“鲁郭茅巴老曹”之外，还有罗素、卡尔维诺、杜拉斯、许倬云、查良铮，才懂得按图索骥地找到《情人》、《西方哲学史》、《1984》、《树上的男爵》等一大批经典著作。他们和王小波的作品一起都在时刻提醒着我，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诗意世界。生而为人，要热爱智慧，努力成为思维的精英；有些知识虽然没有用，但仅仅因为它的美，就值得我们永远追求。

当然，这些年来，随着阅读兴趣逐渐从文学转移到社会科学，我已经很少读王小波了。即使重读，也大多是带着批评。毕竟，启蒙之后，还有更远的路要走。许多人认为王小波是能拿诺贝尔奖的，我觉得这有点拔高了。一味赞美，也是一种捧杀。

算起来，从我第一次读到王小波到今天，也有十多年了。十多年，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正在稳步向中年人迈进，虽然我也日渐发现生活真的就像王小波所言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，但我仍然相信他在《万寿寺》最后写下的那句话：

“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。”